

# 乐山崖墓佛像与佛教传入问题

向玉成

(乐山师范学院 旅游发展研究中心, 四川 乐山 614004)

**摘要:**乐山崖墓佛像问题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难解之谜。通过对乐山崖墓佛像发现和研究情况的回顾分析,佛教传入乐山的线路问题虽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但东汉时佛教已传入乐山地区则是可以肯定的。

**关键词:**乐山崖墓;崖墓佛像;佛教传入;东汉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4)03-0126-05

## 一 乐山崖墓与崖墓佛像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史家意见不一。《三国志·魏志》有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记载。沈起炜先生《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亦载:“公元前2年(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一作秦景宪)受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国知佛经始此。”[1](111页)最流行的是汉明帝感梦,遣使西行求法一说。此说见于多种记载,内容也很不一致,其中最早为著于东汉的《四十二章经序》,其后《后汉书》、《魏书·释老志》等均有记载[2](94—99页)。其事大略为:东汉永平间,因“孝明帝夜梦金人,项有日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付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于天竺,写浮图遗范。乃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又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门西。摩腾,法兰咸卒于此寺”。据此,则摄摩腾、竺法兰二位实是最早见于记载的两位印度僧人,洛阳白马寺则是中国最早的、并由皇帝敕建的佛寺。史载,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中原地区是在东汉永平十至十一年(公元67—68年)时,明帝派人到印度取经返回洛阳建白

马寺,翻译佛经而传播全国各地的。《三藏记集》卷2谓:“东汉明帝永平六年(公元63年),派使臣蔡愔、秦景等到月支国迎请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二僧到洛阳,住白马寺。永平十年(公元67年,沈起炜《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记为次年)译成《四十二章经》。”这是中国第一次有佛教经书的记实。上述资料证实中国佛教的传入是公元前2年,有经典的记述在公元67—68年。一般而言,这是佛教史的主流[3](1—2页)。

东汉通过各种途径与西域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佛教已随之传到乐山。在乐山麻浩崖墓中发现的浮雕石刻佛像,是我国最早的石刻佛像。1940年以来,学者们在乐山麻浩一号崖墓门楣上发现的著名的“麻浩佛像”(其时代在汉末建安至蜀汉年间)、柿子湾一号崖墓左后室和中后室门楣上的两尊佛像、五通西溶镇崖墓门楣上的佛像、彭山陶摇钱树座佛像、乐山西湖塘“施无畏印”佛像陶俑等,说明印度佛教传入乐山的时间很早,且很快深入民间。

先说乐山崖墓的情况。

崖墓,是汉晋四川最具特色的一种墓葬形式,而

收稿日期:2003-08-25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课题《乐山旅游史纲》(编号SA02-071)相关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向玉成(1969—),男,四川省南部县人,乐山师范学院旅游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史学硕士。

四川又以岷江中游地区(尤其是今乐山市境内)数量多、规模大而闻名于世。乐山崖墓,学术界指原乐山县及相邻的夹江、青神、犍为的崖墓。此处“乐山崖墓”是一个地域概念,包括乐山地区和彭山地区的崖墓。其时代为西汉至魏晋南北朝,绝大部分为东汉至蜀汉时期。1985年,新华社通讯把乐山崖墓列为四川九大文物古迹之一,说“四川乐山地区有崖墓10000窟以上,为全国之冠”<sup>①</sup>。据1987年文物普查,总数约1.3万座(不包括彭山崖墓),是全国崖墓分布最密集、规模最大也最具代表性的地区。有些地方一山即达数百座,几乎整山皆洞,密如蜂房。有的大墓墓室深达35米,享堂宽30米,高2—3米。其内部布局依照人世房舍宫殿而凿,有厅堂、厢房、侧室、棺室、灶室,以及大量佣仆、明器、陶器、金属器皿和精美的石刻、壁画,俨然地下宫殿。墓中保存和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说明崖墓文化代表了当时岷江中游地区文化艺术的最高成就,反映了汉晋时期本地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和中外交往的全貌,具有极大的历史、艺术、科学和旅游价值,被学术界誉为“汉晋时期重要的考古学遗存”和“崖上的宝库”。目前学术界虽已对其进行了研究,但尚有大量疑难问题处于争论之中,崖墓本身之谜尚未尽数揭开。其中,与乐山佛教传入问题密切相关的当数崖墓佛像问题。

1940年,杨枝高先生在乐山麻浩一号墓门楣上发现了著名的麻浩崖墓浮雕石刻佛像(该处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像有圆形背光,高肉髻,身着通肩天衣,右手作施无畏印,左手握衣端,似结跏趺座,高浮雕,绝非后人伪作。其年代为蜀汉时期。杨枝高先生当时也判断这是“佛教来华未久”的佛像,并认为它的雕造年代在东汉时期(唐长寿先生认为其时代在汉末建安至蜀汉年间)。这是我国最早的石刻佛像,同时发现的还有印度题材的“大鹏金翅鸟图”,此事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难解之谜[4]。

自此以后,早期佛教遗物在乐山时有发现。此后50年来,在乐山共发现5处佛像和早期佛教遗物。

1. 柿子湾佛像,二尊。位于乐山柿子湾一区1号墓中后室门楣和左后室门上方,造型技法与麻浩佛像大体相同,其年代为汉魏时期[5](7页)。1955年,闻宥先生编著的《四川汉代画像选集》一书出

版,他在书中首次公布了乐山柿子湾1号崖墓内的这两尊东汉浮雕石刻佛像。

2. 彭山摇钱树座佛像,一尊。1942年,中央博物院在彭山发掘了一大批崖墓,出土文物重达22吨。其中,166号崖墓出土了1件陶质摇钱树座,座上塑有一坐二立的3尊人像。经仔细辨认,中间坐着的人像是一尊佛像,并认定其年代属东汉。佛像塑于摇钱树座上,造型与麻浩佛像大体相同。其年代为建安至蜀汉时期。

3. 乐山西湖塘施无畏印陶俑,1986年出土于乐山城西郊西湖塘崖墓,现存乐山崖墓博物馆。其右手作施无畏印,确为与佛教艺术有关的造型无疑。其年代应为东汉晚期[6]。

4. 最近笔者与课题组进行省教育厅课题《岷江中游崖墓文化与开发研究》的现场考察时,在乐山肖坝有名的赖子湾大墓七个后室的右侧第二后室墓门柱上,发现泥灰脱落后露出的文字题刻如次:“炳忠、光远、兴佛”,“三人合,名炳忠、光远,二老一少”,字径近10厘米,隶体带篆意。此条题刻直接说明了合葬墓的情况,且“兴佛”是否与“佛教”有关,值得研究[7]。

其间,四川其它地方还发现了一些早期佛像。

1981年,四川省文管会发掘了忠县涂井蜀汉崖墓。数年后,重新观察出土文物,发现5号、14号墓出土的3株铜质摇钱树树干上,居然有多达14尊的佛像。发掘者考证,它们的年代都在蜀汉前期。

1989年,绵阳市博物馆抢救发掘了何家山1号崖墓,墓中出土了1株铜质摇钱树。随后发现铜树干上有5尊佛像。清理者认为,它们的年代在东汉晚期。

从1940年到1989年的50年中,在四川五个地点发现了23尊佛像。其年代早至东汉,晚的也在蜀汉前期。数量之多、年代之早,为全国所仅见。江苏连云港、山东沂南佛像与之相比,真可谓小巫见大巫。在中国早期佛教遗存中,四川五处佛像处于无可争议的“大哥”地位。中外学者研究考察络绎不绝,俱将目睹实物视为一大快事。

虽有学者对几处佛像是否属于崖墓本身持怀疑态度,或认为麻浩、柿子湾佛像系后人所增刻,或认为彭山摇钱树座是后人改崖墓为佛事场所后带入。但实地观察,麻浩、柿子湾佛像均是高出门楣石面的高浮雕,若为后人增刻只可能低于石面,所以不可能

是后人增刻;彭山摇钱树座形制风格属汉,从发掘情况看,所在的166号崖墓并没有被后人改作佛事场所,显然摇钱树座不是后人带人,而属崖墓本身随葬品之一[8](181—186页)。故其时代也应为东汉时期。

据彭山文管所的研究,目前所知乐山最早的崖墓为彭山江口高家沟崖墓,其时代为王莽时期至东汉初年[9]。有明确年代题刻的最早的崖墓,据乐山市文化局唐长寿、帅秉龙二位的研究,是乐山城郊肖坝“永平元年”(公元58年)崖墓,它比80年代所识的新都马家山崖墓M5(永平八年即公元65年)更早,是目前所发现的四川最早的纪年崖墓[10]。此后的“建初”年间(76—84年)、“延熹”年间(158—167年),乐山地区崖墓葬已较为普遍,如乐山麻浩有题刻“阳嘉三年”(即公元134年)之崖墓<sup>②</sup>。至蜀汉、两晋,崖墓仍在开凿,因《舆地纪胜》云乐山有题刻“晋刺史姚思永神道”的崖墓。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找到这座墓。此后崖墓葬制逐渐结束,到南北朝时期,开凿崖墓在乐山已难得一见了[5](27—31页)。据罗二虎先生的研究,昭化宝伦院屋基坡六朝崖墓和宝伦院镇南北朝崖墓是迄今为止四川所发现的年代最晚的崖墓,则比乐山崖墓结束的时间更晚[10]。

总之,目前崖墓研究界大都承认乐山崖墓的时代为新莽至两晋时期,大规模开凿是在东汉时期。如果说河南永城梁孝王墓是最早的标准崖墓,稍后的河北满城汉墓、江苏徐州龟山崖墓、山东曲阜九龙山崖墓在此基础上发展到高峰,到西汉晚期这些地区的崖墓(有学者称之为关东崖墓)就已销声匿迹[5](15页),那么乐山崖墓的始凿时代应晚于中原地区。实际上,乐山的1万余座崖墓中应该说肯定有开凿于西汉时期者,只是尚未发现直接的文字题刻记载。乐山上五处早期佛教遗物均出土于崖墓中,或雕刻于门楣之上,或塑于摇钱树座上,或铸造在摇钱树铜树干上。

## 二 分析

上述早期佛教遗物在中国佛教史、汉晋中外交流史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近几十年来,西南丝绸之路的研究,很多方面与此相关。1949—1950年,美国学者艾瑞慈到乐山实地考察后,认为麻浩佛像具有明显的犍陀罗艺术风格[11](66页)。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认为,四川的佛教“更

大的可能是通过云南输入的”[2](185页)。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王家祐先生认为,如果说连云港汉代摩岩佛造像是由海道传去,秦地佛祠由西域传入,那末,乐山、彭山的佛造像则当由滇、缅传入。佛像既已塑于陶座,刻于崖墓,可见四川佛像普及于民间的时代早于江南与中州,乃是通过蜀——身毒道传来。由此看来,蜀身毒道的开通不但早于西域丝绸之路,而且佛教经南道传入并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也较北线为早,这条“南丝绸之路”与北道一样,不但对国际贸易作出了贡献,而且在国际文化交流史上也硕果累累[12](170页)。唐长寿先生的看法则稳妥一些。其一,佛教本身当时也是外来文化交流的一个内容;其二,四川佛教文化的传入途径和过程可能是较为复杂的,不能断定佛教就是由滇、缅传入;其三,四川巴蜀后裔的土著汉人在吸收、传播佛教上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其四,与长江中下游发现有早期佛教遗物的地区相比,四川地区人们对佛教的吸收理解要滞后一些;其五,四川早期佛教造像与后一阶段(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在时间上出现明显断裂,风格又殊异,可能二者来源有异,流传途径有别[6]。

在早期石刻佛像发现之前,人们根据文献记载,认为早期佛教传入中国首先是到东汉首都洛阳—中州地区。诸如汉明帝“夜梦金人”、“永平求法”、“白马驮经”、汉桓帝宫中祀佛等,均被认作佛教传入中国的典型事例。但至今在洛阳地区未发现一尊早期佛像。而乐山的五处佛像中,有四处出土于长江岸边(岷江在古代被认作长江正流),一处出土于秦蜀交通干道——金牛道上,均位于四川古代交通主干线上。这种与交通干线紧密相关的特点,更加引起学者们对四川早期佛像传入路线的兴趣。

再从四川的整个情况来看。四川23尊佛像,或是铜质,或是石质,或是陶质;或大至37厘米,或小至5.2厘米,但它们的模样却千篇一律:高高的肉髻,似隐似现的厚重衣饰,右手举胸前作“施无畏印”,左手拳握衣角,结跏趺坐……好似同一个师傅带出的几个徒弟的作品,又好似同一个“标准像”的几个翻本。若与印度早期佛像相比,与犍陀罗佛像非常接近。有的佛像肉髻似螺形,又与秣菟罗佛像比较一致。四川早期佛像如此之多,形态如此一致,独占华夏。从中原找不到渊源,从传统认为的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北方丝绸之路也找不到踪迹。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路线,学术界认为有以下

三条路线[13](435—436页),并大致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8](185—186页)。

第一种观点可以称为“南来说”,即认为佛像传入路线是神秘莫测的南方丝绸之路。据专家考证,该路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已经开通,在西汉称为“蜀——身毒道”。该道从成都经四川、云南,出缅甸,到印度,本为民间商道。公元前122年,大探险家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蜀布”和“邛竹杖”,十分惊讶,问知从印度来,从而发现了这条古道。其后,两汉皇帝开为官道,日益畅通。持“南来说”的学者认为,该路是四川到印度距离最短的陆上交通线,开通又比北方丝绸之路早约2个世纪。从图像学的角度来看,四川早期佛像又具有秣菟罗佛像的特点,恰好秣菟罗佛像流行于印度中南部,在地理位置上更接近四川。因此,印度佛像经南方丝绸之路传入四川,应无多大疑问。但是,在南方丝绸之路的中间路线上的云南等地,至今未发现一处早期佛教遗存,故对“南来说”进行责难者也大有人在。

第二种观点可以称为“西来说”,即认为传入路线是羌中西域道。其走向是由成都溯岷江傍积石山或青海湖过羌中地至格尔木,再至鄯善沿昆仑山北麓至于阆西行到印度。此线可以避免匈奴,至少在西汉初已成为国际通道,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从大夏回国,走的就是这条羌中道。解放前茂县出土齐永明元年(483年)佛教造像,证明这条路线在南北朝时仍是一条重要的佛教传播路线。持此观点的学者也从图像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四川早期佛像完全是犍陀罗佛像影响的结果。犍陀罗佛像曾盛行于印度西北地区,与西域接近,佛像经西域羌中道传入四川也在情理之中。但此观点不能很好地解释四川早期佛像形成的时间问题。

第三种观点可称作“北来说”,即认为传入路线是通过北方丝绸之路到东汉首都洛阳后,再从洛阳经“蜀道”或“江道”进入四川。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佛教初传,就是佛经、佛像并行。永平求法,便包含求取佛像。牟子《理惑论》、袁宏《后汉纪》、范曄《后汉书》、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等记载:东汉明帝永平求法后,在首都洛阳多处造作佛像及佛图。据《魏书·释老志》,洛阳白马寺的佛像为全国各地佛像的范本。作为一代首都,洛阳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每当一种新东西出现,既可得风气之

先,也可率风气之先,影响各地。恰好四川五处早期佛像都在沟通四川和洛阳地区的干道上,且年代均晚于文献所载的中原佛像。故“北来说”也有理由。但问题在于至今在洛阳地区未发现一尊早期佛像。

仔细审阅四川五处佛像的资料,就会发现一个重大的情况,即它们都出土于崖墓中,或雕刻于门楣之上,或塑于摇钱树座上,或铸造在摇钱树铜树干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对此,目前主要有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是:汉至蜀汉,四川崖墓是与砖室墓并行于四川的一大墓葬形制,与砖室墓葬俗有同有异。崖墓分布最集中的地区是彭山、乐山、宜宾、三台等地,为蜀、丹犁、郫等先秦土著民族保留较多的地区。而砖室墓最密集的成都平原,则是中原人民迁蜀聚居的主要地区;从崖墓画像石内容看,神异巫风的内容占压倒多数,而砖室墓多是表现国家礼仪、儒家伦理的车骑行列、耕读讲经的内容;崖墓墓主人身份较低,与砖室墓墓主多高官长吏形成鲜明对比;砖室墓有不少自言为中原人士后裔的碑铭,而崖墓则无一说明墓主祖藉中原的材料。凡此种种,说明崖墓主人应是四川先秦土著民族的后裔,虽经秦汉已逐渐汉化,但仍保留了浓厚的旧民族传统。表现在文化意识上,重神异巫术,而较少儒家伦理的羁绊。所以,当佛教以一种“新神”的姿态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时,就能很快被接受、供奉,并纳入旧有的神仙系统之中,并置其像于神秘的墓葬之内。

另一种解释是:崖墓是四川地区少数民族僚人的墓葬。佛教从南方丝绸之路传入,首先进入僚人地区,为重鬼神的僚人所吸收供奉,故在死后的墓葬中雕刻佛像以作供奉。但崖墓为僚人墓葬的说法缺乏充分的根据。仅以其文化看,还停留在“略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长幼次第呼之”的状态[14](《僚传》)。佛教即使传入,恐怕也难以立足。况且无论从文献还是考古资料上,都没有证据。故有学者认为这一解释显得十分勉强。

所以,就目前来看,佛像与崖墓的关系问题还不是在目前工作的进程下能够圆满解决的[8](185—186页)。

但可以肯定的是,公元1世纪,佛教已传入乐山地区。峨眉山—乐山大佛在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价是:“公元1世纪,在四川省峨眉山景色秀丽的山巅上,落成了中国第一

座佛教寺院。”[15]说明国际上也承认,公元前后佛 第一座佛寺。  
教已传入乐山地区,且公元1世纪峨眉山已兴建有

注释:

- ①参见《不愧为天府之国》,《半月谈》1985年第9期。  
②高文、方成纲编《四川历代碑刻》(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第18页收录有此题刻图文,可参看。

参考文献:

- [1]沈起炜.中国历史大事年表[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  
[2]任继愈.中国佛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3]何志愚.佛教圣地峨眉山[M].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  
[4]唐长寿.麻浩崖墓旅游开发探讨[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1999,(2).  
[5]唐长寿.乐山崖墓与彭山崖墓[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  
[6]唐长寿.四川早期佛教遗物辨识[J].东南文化(香港),1989,(5).  
[7]向玉成,肖萍.乐山研究综述[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1).  
[8]唐长寿.嘉眉稽古录[M].乐山(内印2001-532号),2001.  
[9]彭山文管所.四川彭山一座残崖墓[J].考古,1991,(5).  
[10]罗二虎.四川崖墓的初步研究[J].考古,1988,(2).  
[11](美)艾瑞慈.麻浩崖墓浮雕考释[A].乐山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崖墓资料汇编[M].1990.  
[12]邓廷良.西南丝绸之路考察札记[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0.  
[13]雷喻义.巴蜀文化与四川旅游资源开发[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14](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5]刘晓芳.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我国“双遗产”的评价[N].乐山日报,2002-08-11(3).

## Luoshan Cliff-Tomb Buddha and Buddhism Introduction Problem

XIANG Yu-cheng

(Tourism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Luoshan Teachers' College, Luoshan, Sichuan 614004, China)

**Abstract:** Luoshan cliff-tomb Buddha is a hard nut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intercourse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Though the route of Buddhism introduction into Luoshan is to be studied, it is confirmed that Buddhism is introduced into Luoshan in Dong Han Dynasty.

**Key words:** Luoshan cliff-tomb; cliff-tomb Buddha; Buddhism introduction; Dong Han

[责任编辑:凌兴珍]